



口译知识与技巧

张坤鹏 韦红佩 选编

广西教育出版社

H1059

2

口译知识与技巧

张坤鹏 选编
韦红佩

广西教育出版社

口译知识与技巧

张坤鹏 韦红佩 选编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宁市民族大道68号)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7.25 印张 150 千字

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5435-1771-X/G · 1358 定价: 3.10 元

(桂)新登字05号

前 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我国对外交往的日益增多，翻译工作的桥梁作用也越来越重要。近年来，有关笔译的书籍已出版不少，但有关口译技巧方面的书籍却凤毛麟角。编者和外事人员相处较多，大家在交谈中都盼望能读到一本介绍口译技巧的书籍，以便更好地提高口译水平，增强工作效率。为此，我们注意收集有关提高口译能力方面的经验与体会一类的文章，亦将其编辑成这本《口译知识与技巧》。这些短小精悍的文章，是中外翻译工作者智慧的结晶，不仅详细地介绍了口译工作的重要作用和特点，而且就如何真实、准确、流畅地做好口译作了详尽的论述，这些宝贵的经验、体会，是实用的、有指导意义的。编者在长期的口译工作中，就从他们所介绍的经验中获益非浅。我们希望把这些宝贵的经验通过本书介绍给同行，共同为推动和发展我国的口译事业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在将这些珍贵的资料交给出版社之前，本应事先征得原作者及有关编者的同意，但由于我们对许多作者目前的地址和工作单位等情况了解不详，因而未能一一联系，同时，有些文章一时无法查到作者姓名和原刊载的报刊，一并恳请文章的原作者、刊载者鉴谅，请在看到本书出版之后，直接与广西教育出版社或编者张坤鹏（广西北海市和平路83号，邮编536000）联系，以便按规定付给稿酬和样书。

本书在收集和编辑过程中，曾得到广西教育出版社编辑同志、广西外事办公室黄平西、李初梅两同志和北海市外事办公室全翠芳同志的大力帮助，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

1992年4月于北海

目 录

前 言	(1)
周总理与翻译	过家鼎 (1)
冀朝铸同志谈翻译工作	(7)
高翻贾丕才的回忆和感受	(20)
韩素音女士谈翻译	(26)
谈谈翻译工作	凌 青 (33)
谈谈怎样做一名合格的外事翻译	陶胜利 (44)
怎样才能当好翻译	(53)
我做翻译工作的体会	蒋 韧 (63)
赫伯特谈：口译的意义和培训	(71)
浅谈外语培训的方法	赵明昌 (78)
口译的表达技巧	[瑞士]让·艾赫贝尔 (83)
赫伯特谈：即席传译技巧	(95)
赫伯特谈：口译的四个难题	(100)
外事汉英翻译体会	王弄笙 (104)
翻译的政治敏感性	(114)
政治会谈口译的点滴体会	过家鼎 (118)
漫谈翻译笔记	(129)
口译表达与译员风度管窥	晓 全 (133)
口译琐谈	张兴华 (136)
谈谈口译前的准备	胡庚申 (142)
略谈口译笔记	方凡泉 (147)

笔记格式与工具·····	方凡泉	(151)
口译工作的“三勤”·····	陈海若	(156)
浅谈口译的临场发挥·····	安太德	(159)
学点外国谚语和俗语·····	吕桂生	(161)
翻译不当会闹笑话·····		(164)
谈谈口译中的“错译”·····	胡庚申	(168)
口译六“必要”与一“妙诀”·····	唐建文	(173)
翻译的灵魂——理解·····	白 凡	(179)
谈谈数字翻译·····	张广瑞	(182)
浅谈法语口译中的文化问题·····	陆应飞	(184)
日语口译技巧摭议·····	丛 文	(187)
专家谈口译·····	卫东编译	(191)
浅谈口译技巧·····	安 文	(194)
浅谈外国记者采访的口译工作·····	方凡泉	(197)
口译工作者如何加强记忆力·····	齐锡玉	(204)
试论工业口译中思维意向的一致性·····	张世广·李建瑁	(212)
浅谈译员的协调作用·····	王殿军	(222)

周总理与翻译

过家鼎

周总理的丰功伟绩贯穿在我们对内对外的各项工作中。无论哪行哪业的人，都无不直接间接地体会到周总理对他们事业的关心和指导。作为一个外事翻译工作人员，每当回忆起周总理对翻译的亲切关怀和谆谆教导，我的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

1962到1971年期间，我在国内从事口笔译工作，虽然直接给周总理当口译的次数并不多，但通过陪同周总理出访亚非14国和接待国宾等外事活动，通过参与各种政治会谈的记录和笔译工作以及重大外交文件翻译的请示过程，我有机会亲身聆听和体验到总理对外事翻译工作的一些具体指示和要求。尽管我接触到的只是一鳞半爪，但归纳起来，有的足以成为我们外事翻译工作的指导原则。

一、对政治会谈口译的一般要求是“准确完整，通顺易懂”

大家知道，周总理对待外交工作是那么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对翻译工作也同样要求十分严格。周总理自己不能完全用外文表达，但能听懂几种外文，尤其是英文。外宾讲完后，他对其大体意思已有了一个概念，然后便仔细地、一字一句地听取翻译。他的要求首先是“准确完整”。他自己

的发言。思路清晰，逻辑性强，语句结构严谨，几乎是出口成章。每次讲话，记录下来，毋须多加整理，便是一篇易读的文章。他了解翻译的困难，每段讲话一般不太长。在外事活动中，讲话人一般都是利用翻译的间隙时间思考下一句或下一段的讲话。周总理却与众不同，每讲完一段话后，便注意倾听翻译如何表达他自己的讲话。他能对翻译起到很好的检查作用。翻译稍有错漏，便会被他发现，当场予以纠正。总理并不要求翻译使用高深华丽的词汇，只要求语言通顺易懂，但对于“准确完整”却是一丝不苟的。尤其是对关键的要害用语，要求特别严格。有时他对某一关键用语的译法提出异议，要求翻译改用另一个词来表达。翻译有时提出好几种选择，由他来判定使用哪个词比较合适。

在笔译中，我们在翻译一些重大对外声明或文件时常遇到一些关键的重要用语，对其政治含义和分寸掌握不住。究竟在外文中应该用哪个字来表达最合适，我们往往没有把握。为此，我们常常通过秘书，直接请示周总理。在午夜或拂晓前我们通过秘书从电话里接到总理的指示，使文件得以最后定稿，及时出手，保证了文件的政治质量。

周总理对翻译的某些指示，见解精辟，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显示其意义的深邃。例如，“毛泽东思想”在英文中应如何表达，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在“文革”时期，大多数人主张译为“Mao Tsetung's Thought”。周总理认为不妥，他指出，“毛泽东思想”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译为 Mao Tsetung Thought 为好。这就是我们现在将毛泽东思想译为 Mao Zedong (改为汉语拼音) Thought 的依据。

二、结合业务，了解政策，熟悉情况

周总理一再强调，翻译一定要结合外交业务，了解政策，熟悉情况。他并具体提出，翻译应该学习起草电报，写发言稿，参加会谈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如情况研究、政策议论等。他认为，翻译人员处在外事工作的第一线，最易了解和熟悉对方的情况。同时翻译必须熟悉我方自己的政策意图，了解所谈问题的背景和来龙去脉，不仅了解一件事情的现状，而且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双方的不同立场和分歧的关键所在，解决问题的方案有哪几种，最高方案是什么，最低方案是什么。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抓不住要害，划不清双方立场的界线，乃至造成政治上的失误。他主张放宽限制，让翻译阅读有关的文电和资料。在总理这样的亲切关怀下，翻译同志无不兢兢业业，在翻译前仔细阅读有关材料，认真地进行准备，决不敢掉以轻心，草率从事。

三、扩大知识面

周总理十分强调扩大知识面。他常对翻译说，翻译不能只注意语言文字的表达，一定要扩大各方面的知识。1962年某次接见外宾，我第一次尝试给总理当翻译，刚开始还算顺利，但遇到总理介绍某某是“居士”我就翻不出来。总理专门解释了“居士”的含义，并嘱我回去研究应该如何翻译。事后，总理向有关的领导谈了对翻译人员的一点意见，指出翻译除提高语文水平外，一定要扩大知识面。为此，有关领导写了一篇简报，通报全体人员。有一段时期，总理在与外宾谈话中经常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教训。他常考问翻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何时开始的？“苏台德区”、“绥

靖主义”、“闪电战”、“马其诺防线”等的外文是什么？为此，我们专门收编了有关二次世界大战的词汇，供翻译熟习牢记。日本人名、地名的英文译法并无规律可循，全靠死背硬记。总理要求翻译至少要记住一些常用的日本人名、地名。总理还时常测问一些与当时形势有关的国际知识。为此，我们常预作准备，除了背诵以外，还把有关材料记成卡片带在身上，随时查阅。

四、尊重翻译，充分发挥翻译的积极性

大家知道，在国际上翻译是一种自由职业，他们的薪金很高，但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地位。他们是一般雇员，既不是外交人员，也不是政府代表，往往是根据合同履行职务，许多是单项短期合同，合同期满，当即离去。因此，在许多国家，高级官员与翻译之间是雇主和雇员的关系，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会谈时，翻译坐在后排，有的连座位也没有。宴会上，翻译不入席，他们既不是东道国的主人，也不是被邀请的来宾。多数人连饭也吃不上，水也没有喝，有的甚至要站在主人座位的后面，像招待员一样地随时侍奉，所不同的是，翻译提供的服务不是上菜撤盘，而是替双方传话。在我国，外事翻译人员的地位大不相同，他是我们国家的外交人员，也是政府代表之一。会谈时，他坐在紧靠我国领导人的左、右边；宴会上他正式入席坐在主人的左边，受到与其他主人或客宾同等的待遇。这样的传统与周总理的亲自过问和指示是分不开的。周总理接见外宾时，一贯强调翻译坐在紧靠他的席位上，甚至反对把翻译安排在正式席位后面的加席上。他要求翻译注意观察他的表情和手势，以领会他讲话的精神，宴会上不仅让翻译坐在他的旁边，而且谈话有间歇，

以便让翻译能抽时间吃饱喝足。出国访问时，东道国往往根据自己的惯例不给翻译准备席位。周总理专门指示礼宾司长同对方交涉，要求对方尊重中国的习惯，在会谈和宴会中安排让翻译坐在他的旁边。在周总理的坚持下，许多国家都破例为中国翻译安排了座席。例如，1964年初，总理访问埃塞俄比亚，在阿斯马拉会见了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埃皇在阿斯马拉为周总理一行举行宴会。埃方出席的全是皇室人员，当时作为翻译的冀朝铸同志和我也出席了宴会。冀朝铸坐在周总理的身边，我坐在陈毅副总理的身边，这在埃塞俄比亚来说是破例的，完全是出于尊重周总理的意见。

有时，总理接见外宾后举行便餐，除了主要翻译外，他还关照要安排让陪同的其他翻译甚至记录人员一起就餐。与外宾合影时，他一定要让翻译参加，翻译难以躲让。有一个时期，在发表会见消息时，总理还曾要求新华社记者把翻译的姓名也列上。

周总理一方面对翻译要求十分严格，一方面平等地将翻译当作同志看待。在会谈过程中，总理经常与翻译商讨对策，要求翻译出主意，当参谋。为了与对方达成联合公报，往往先由对方提出一项公报草稿，由我们对其中的某些部分提出修正。为了提出对案，总理常要求秘书和翻译进行研究，拟出各种措辞，供他参考采用。在总理面前，翻译人员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工作起来会自觉地产生一种高度的责任感。

五、和蔼可亲，关怀备至

在接见外宾时，总理每次都提前到达接待地点。在外宾到达前的间歇时间里，总理听取陪见人员的汇报，也与他们

(包括翻译)交谈情况。在出国访问下榻于国宾馆时，总理与秘书、翻译工作人员一起进餐，席间无拘束地交谈。在汽车里有时只有一名翻译和警卫陪同，总理常与他们谈观感，拉家常，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有一次，在非洲一个国家的宾馆里，上菜的服务员好几天没有弄清楚究竟谁是中国的总理，谁是随行的工作人员，这已传为佳话。

总理对翻译的关怀从政治思想直至生活细节，可谓无微不至。一位翻译婚后数年仍无儿女，总理亲自嘱咐吴阶平大夫为他诊断，经过治疗，他爱人怀了孕，后来还生了二胎。

总之，给周总理当翻译是莫大的光荣。尽管在他身边工作有时十分劳累和紧张，但总理那种日以继夜，不知疲劳的忘我精神，使我们感到渺小而惭愧，总觉得自己应该再努力一些，再刻苦一点。同时，总理的谆谆教导和严格要求，又使我们永不敢自满，任何时候都需要孜孜不倦地学习，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总理对我们的期望。

(原载《广西外事》86.7)

冀朝铸同志谈翻译工作

编者按：冀朝铸同志已从事翻译工作30多年了，其中有17年是给周恩来总理当翻译。最近他在江苏外办与同志们谈他翻译生涯中的体会和看法，现转载供大家学习、参考。

一、翻译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心理素质

当好一个翻译，首先要强调政治素质和政治责任感。我是在美国长大的。我9岁到美国去，20岁时朝鲜战争爆发，我回国参军到朝鲜前线，参加谈判工作，然后回国。那时，我的英文可以，但中文很差。我刚到美国时，在国内才念完小学三年级。由于两个原因，我在美国无法继续中文学习：一是我大哥是地下党，父亲是民主人士，但是一直为党工作，这样的家庭不允许与华人接触，怕遇到国民党特务，只好在美国孩子堆里生活。因此我从9岁起，就在美国人堆里长大，没有接触过其他任何中国人，直到我在哈佛大学念书时，才碰到我们的地下党同志。回国时，我是大文盲，一个大汉字不识，说起中文来结结巴巴的。后来通过两年功夫学习，才算过了关。怎么学呢？同志们白天一字一字地教我简单的中文短文，然后我用英文注上音，晚上背，背熟了，再抄，这篇短文搞得滚瓜烂熟了，再请大家教下一篇。文章慢慢加长。以后，就有重点地看一些有关的书。二、三年以后，我可以

做一些翻译工作了，但是领导对我总是不放心，因为，怕“洋娃娃”中文不行，给领导同志做翻译会出洋相。那时，给我的任务并不重要。印度总理尼赫鲁来华访问，我给他的佣人做翻译，缅甸总理吴努来访问，我给他的警卫当翻译。其实，并不需要什么翻译，就陪他们吃吃饭。吃饭时，他们说：“我要杯咖啡，咖啡里不放奶。”我就照翻一遍。尼赫鲁、吴努到中南海与我国领导人会谈，下面的人无事干，我们就放电影给他们看，我就翻给他们听。我的英文很流利，他们看得很高兴。外交部领导觉得我不错，可以试一试。这样，一夜之间，我就从给我们国宾的佣人当翻译，一下子跳到了给周总理当翻译。那时的国宴在北京饭店举行，最多50桌，外国的首脑和他们的佣人同时邀请，一视同仁。佣人坐第50桌，开始我也在第50桌。有一天交际处(后来的礼宾司)的同志突然找我：“小冀，今天总理要你当翻译。”我大为吃惊。于是，我从第50桌坐到了第一桌。这样，我就有点飘飘然，到云彩里去了。两国总理席间谈话，我翻得相当顺利，汉译英就更不成问题了。周总理站起来讲话，交际处的同志就把译成英文的讲话稿给我。总理上去念稿子，我也就上去念英文稿子。我一站起来，就更飘飘然了。因为是为周总理当翻译，下面还坐着陈老总、贺老总这些元帅副总理和部长，还有各国大使，我想，在他们眼里，好像我就是总理了，总理在那里讲，我也不大听了，到时候反正念稿子就是了。总理讲话习惯于离开稿子，根据当时具体情况，临时加几句话，但是，我并不了解。总理讲过之后，我就继续高高兴兴地念英文稿子，总理临时加的几句话，没有翻出来，马上就听到：“小冀，你太紧张了。换别人。”就这样，我又从第一桌，退回到第50桌。我很难过，交际处也很紧张。但是，第二天总理还是要

我去，交际处同志赶紧对我说：“这次集中精力听总理讲话，不要再开小差了。先给总理翻，再给外国人翻，其他人的讲话，就不理他。”那天正好召开北京市群众欢迎大会。大会发言之后，司仪宣布：“现在。向贵宾献礼献旗。”我事先知道司仪有翻译，因此司仪的话就没有注意听。总理不知道司仪有翻译，就说：“小冀，你怎么不翻司仪的话呢？”这下子我急了，只是迷迷糊糊听到什么献礼，就翻出来了：现在北京市向贵宾献礼。平时，周总理基本上能听懂我的英语，外国人讲的英语能听懂一半。这句话总理听懂了，马上就问我：“还有献旗呢？”当时，我羞愧得真想钻到地里面去，心想：昨天才犯了错误，今天又犯错误，怎么了得！这时，幸好司仪的翻译开始翻了，我得救了，就对总理说：“已经翻了。”周总理当时没有响，过了半分钟，对我说：“小冀啊，刚才你没有说实话。”这么一来，我吓昏了，对周总理没有说实话，还了得啊！我又作了检讨。

周总理这个人在工作上非常严格，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不知挨批过多少回，但是，他从来不记在心里。在日常生活中，对人无微不至地关怀。就在这件事后不久，我随周总理出访。我最怕潮热，一潮热，皮肤搞不好就烂。出访的是热带国家，我的背后全烂了，穿着中山装难受得要死。不知怎么让周总理知道了，总理马上让他的医生给我看病，而且一定让我休息。另外，我的很小的事情他都知道。我们结婚比较早，但七年后才有孩子。我随周总理在巴基斯坦访问时，爱人来信说是怀孕了。总理不知怎么了解到了，很高兴地向我祝贺，还说：“小冀，你的孩子以后一定要好好劳动。我们这次访问巴基斯坦和坦桑尼亚。巴基斯坦是男人在田里干活，女人在家里；而非洲是女人在田里干活，男人呆在家里。

如果你们生男孩，应该起巴基斯坦这个名字，如果是女孩，应该起非洲这个名字。”因此，我儿子的名字就叫小坦。

说到工作，总理半点都不放松。那次我没说实话，周总理还是原谅了我，让我干了下去，知道我是小青年，有爱面子的思想。过去，总理每年都要到外交部作报告。这次事情之后的六、七个月，总理又到外交部作报告。他说：当一名外交战士、共产党员，最重要的是对党对人民要忠诚老实，不要说半句假话，如果不忠诚老实，轻则毁了自己，重则危害国家。以后，我始终牢牢记住总理的教育，任何时候都从政治高度看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外交人员政治素质的起码要求。如果明知翻错了，或是没有听清楚，为了要面子，按照想当然翻出去，就要造成很大的损失。另外，在我们这个领域里，如果工作不仔细，极容易出差错，实质上这也是政治责任心的问题。有一次，缅甸国宾由周总理陪同访问上海，在观看越剧“梁祝”时，总理答应给国宾一套唱片。缅文翻译竟忘了此事。外宾到昆明准备出境，问我方人员：“周总理答应给我的唱片呢？”昆明没有，只好赶紧派专机到上海去取来，这样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可见，参加正式会谈时，没有强烈政治责任感，或不忠诚老实，就会造成政治上的巨大损失。即使日常生活，一不注意，也会造成重大损失。

确实，干我们这一行，来不得半点马虎。有一次民主柬埔寨总理宋双到英国来，要见我。我的秘书对与英国有关的事务很熟，但对亚洲的不熟，宋双和洪森他分不清楚，对我说：“洪森要见你，怪。”我说：“真是怪！第一怪是洪森怎么到英国来？英国又不承认他。第二怪他怎么要会见中国大使？太荒唐了，根本不要理他！”幸好我的小秘书虽然很嫩、很年轻，但责任心很强，就找别人去问，到处去查，结果才